



葡萄美酒出太原

李开周

公元826年深秋，“北京”的一位官员给宰相令狐楚寄了一箱“蒲桃”。

请注意，这里的“北京”可不是今天的北京，而是唐朝的太原。太原在唐朝怎么成了“北京”呢？因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在太原起家的，后来定都在长安，太原在长安北边，所以太原就是北边的京城，简称“北京”。

“北京”是太原在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行政称谓。690年，武则天将太原府设为北都，742年唐玄宗正式改北都为北京。

“北京”是太原，那么“蒲桃”又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葡萄。在唐朝人笔下，葡萄往往被写成“蒲桃”。

话说宰相令狐楚收到那箱来自太原的葡萄，非常开心，不愿吃独食，请一个好友分享。那个好友是谁呢？就是著名诗人刘禹锡。

我们知道，刘禹锡写过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写过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这回他品尝到太原的葡萄，又一次诗兴大发，创作了一首五言排律。全诗较长，摘录中间几句：鱼鳞含宿润，马乳带残霜。染指铅粉腻，满喉甘露香。酿成十日酒，味敌五云浆。

翻成白话文就是说，每颗葡萄都像鱼鳞一样湿润和闪光，又长又圆，像马的乳头带着残霜；拿在手上，触感像铅粉一样滑腻；送进嘴里，从咽喉溢出甜香；如果把这些葡萄酿成甜酒，十天即成，味道比得上传说中的美酒“五云浆”。

刘禹锡将葡萄的形状比成马乳，不仅是比喻，而且是写实，因为唐朝确实盛行一种马乳葡萄，据说是从西域引进的。按《唐会要》第一百卷记载，公元647年，西突厥的一个酋长向唐太宗李世民进贡“马乳蒲桃”，后来唐太宗又派人从吐鲁番盆地搜集到一批“马乳蒲桃实”，也就是马乳葡萄的种子，在皇宫里试种，相当成功。

又按《太平御览》第八百四十四卷记载，唐太宗不仅试种马乳葡萄，还用它酿酒：“酒成，凡有八色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醍醐，既颁赐群臣，京师识其味。”酿成八种颜色的葡萄酒，味道芳香浓烈，口感如同奶油，唐太宗将其赐给百官，从此长安居民才知道了葡萄酒的美味。

在唐太宗的影响下，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，其中山西的葡萄酒迅速崛起，成为驰名全国的品牌。《唐国史补》下卷有一段话，记载晚唐时期各地名酒，包括：郢州之富水，乌程之若下，荥阳之窟春，富平之石冻春，剑南之烧春，河东之乾和、葡萄，岭南之灵溪、博罗，宜城之九酝，浔阳之溢水，京城之西京腔，虾蟆陵郎官清、阿婆清。又有三勒浆酒，法出波斯。

郢州在湖北，乌程在浙江，荥阳在河南，富平在陕西，剑南在四川，河东即山

西……郢州的富水酒，乌程的若下酒，荥阳的窟春酒，富平的石冻春酒，剑南的烧春酒，山西的乾和酒、葡萄酒，都是闻名于世的好酒。

如今有商家开发“乾和酒”，说是源于唐朝的蒸馏酒，其实唐朝没有蒸馏酒的工艺，只有酿造但不蒸馏的低度谷酒和低度果酒。蒸馏酒是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，从元朝初期兴起，到清朝后期才渐渐流行。今天我们能在唐诗和唐朝史料里读到“烧酒”和“白酒”的字样，可是当时的“烧酒”只是用炭火加热杀菌的低度谷酒，当时的“白酒”只是用无色酒曲酿造以后又不加过滤的浑浊米酒，它们跟蒸馏酒都没有一毛钱关系，千万不能望文生义。唐朝山西的乾和酒究竟是什么酒呢？现存史料没有记载，我们不能瞎猜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唐朝山西已经出产葡萄酒，并且颇负盛名。

唐朝很多诗人爱喝葡萄酒，因此留下一些佳句。例如王翰写过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，李白写过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，鲍防写过“天马常衔苜蓿花，胡人岁献葡萄酒”，刘禹锡写过“野田生葡萄，缠绕一枝高……酿之成美酒，令人饮不足”……这些葡萄酒很可能是在山西酿造的，或者酿酒用的葡萄是在山西出产的。

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在山西漫游，公元748年送别一位朋友，留下一首不成格律的古风：归去不得意，北京关路赊。却投晋山老，愁见汾阳花。翻作灞陵客，怜君丞相家。夜眠旅舍雨，晓辞春城鹅。送君系马青门口，胡姬垆头劝君酒。为问太原贤主人，春来更有新诗否。

该诗第一句里的“北京”仍旧是太原。岑参送完朋友，赶回太原，在一家酒店歇马，店里的胡姬在为客人劝酒。按常理推想，胡姬所劝的酒可能也是葡萄酒——毕竟那是一家在太原的酒店，而唐朝太原以葡萄酒闻名。

唐朝药王孙思邈比较推崇葡萄酒，他的《千金食治》有“蒲桃”条目：“可作酒，常饮益人，逐水，利小便。”意思是葡萄可以酿酒，经常喝，对健康有好处，可以治疗水肿，可以利尿。

孙思邈还在《千金食治》序论中告诫世人：“鱼鲙诸腥冷之物，多损于人，断之益善。乳、酪、酥等常食之，令人有筋力，胆干，肌体润泽。”鱼生不宜多吃，多吃有害健康；牛奶、奶油、奶酪却可以多吃，令人皮肤光滑，力量增长。这段话从侧面说明，唐朝胡风盛行，奶油、奶酪等奶制品已经普及。

为什么要提奶油、奶酪呢？因为葡萄酒富含单宁，略有苦涩，品酒时搭配奶油、奶酪，不仅能压住苦涩，还能让葡萄酒变得非常香滑。相信唐朝酒鬼是有这种口福的，如果是在宋朝和明朝，由于牧区匮乏，牛羊俱少，奶油、奶酪就不可多得了。

王勃仕途起蒲州

季江

王勃，字子安，绛州（今运城市河津）人。他出身儒学世家，爷爷王通是隋朝大教育家、儒学大家，父亲为唐朝太常博士。在这样的书香氛围中，王勃自幼勤奋好学，十岁时便通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家庭熏陶与大唐开放风气，为他提供可自由驰骋的文学天地。

学术之余，王勃常在长安街头游历，宫殿草木皆能激发他的灵感，吟诗作赋、与人对句信手拈来。12岁那年，他偶遇长安名医曹元行医，被其精湛医术吸引，决心学医。面对曹元的婉拒，王勃执着坚持，最终打动对方。父亲问他：“为什么要学医？”王勃回答：“日后父母年迈，若有身体不适，孩儿愿效微薄之力。”顿时，父母热泪盈眶。几年后，王勃不仅医术有成，而且还为难懂的《八十一难经》作注，为后世从医者提供帮助。学有所成后，师傅曹元叮嘱：“出世切忌心高气傲……”王勃记下了师傅的一番吩咐，离师傅而去。

唐龙朔元年（661），来自山东、家

族三代为官的刘祥道，奉唐高宗之命任权检校蒲州（今运城市河津）刺史。此职兼具监察之责，刘祥道在任4年，考察地方官员的同时，也为朝廷举荐人才。当时的绛州与蒲州相邻，为后来的故事埋下契机。

664年，王勃学医归来，一心报国，遂赴京都投简历自荐。然而，因年纪尚小，无人愿意举荐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。转机出现在他听闻刘祥道爱惜人才后，王勃写下《上绛州上官司马书》，文中阐述诸多治国理政之策。刘祥道读完惊叹“此乃神童也”，并多次向唐高宗举荐。王勃得以参加科举考试，在考场中，十六七岁的他脱颖而出，名列前茅。考虑到王勃年少阅历不足，唐高宗任命其为七品县令，王勃由此成为大唐最年轻的官员，开启仕途之路。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王勃留下的千古名句至今为人传颂。回顾他的人生，其仕途的起点正是蒲州刺史刘祥道的举荐，故而以“王勃仕途起蒲州”为题，概括这段重要经历。

与电报有关的记忆

金新

近日，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发布公告，宣布杭州地区电报服务于2025年5月1日全面停止。杭州电报业务停运后，北京将成为国内唯一保留发报业务的城市。

电报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，是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1753年，《苏格兰人》杂志上提出电流通信设想，为电报奠定理论雏形。18世纪末，法国工程师查普设计电报塔，1792年在巴黎和里尔间修建，到1830年欧洲已建成上千个。1799年伏打发明“伏打电堆”提供稳定电流；1820年奥斯特发现电生磁，推动电磁学发展，为电报技术奠基。1837年，库克和惠特斯通展示电报机模型，莫尔斯受启发，1844年成功发送第一封电报。19世纪90年代起，特斯拉、马可尼等推动无线电报发展。

但科技发展遵循新陈代谢规律，随着电话、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普及，电报逐渐走向衰落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与黄侃的“文白斗法”。胡适作为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，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对白话文的强烈反对，其中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、音韵训诂学家、国学大师黄侃的反对最为激烈。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，恃才傲物，其狂妄与尖刻在当时颇为出名。

一次，黄侃在讲课中为赞美文言文的高明，举例说：“如胡适的太太死了，他的家人电报必云：‘你的太太死了！赶快回来啊！’长达11字。而用文言则仅需‘妻丧速归’4字即可，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。”

胡适的反击同样精彩。在课堂上，当有黄侃的崇拜者以文言文电报省钱为由反驳白话文时，胡适说道：“不一定吧。要不我们做个试验。前几天，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，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，我不愿从政，便发电报拒绝了。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，而且非常省钱。同学们如有兴趣，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，看看是白话文省钱，还是文言文省钱。”同学们纷纷拟稿，胡适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意完整的——“才学疏浅，恐难胜任，恕不从命”，但他表示这仍太长。胡适的白话文电文仅5个字：“干不了，谢谢。”他解释道：“‘干不了’，含有‘才疏学浅、恐难胜任’之意，而‘谢谢’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，又有‘恕不从命’而婉拒之义。”这场“文白斗法”，从侧面反映出语言与通信方式的变革趋势。

如今，电报即将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它承载的时代印记、文化内涵，以及无数人与它相关的故事，都将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深处，成为见证时代变迁的独特符号。

